

突破美元霸权束缚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张晓凌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随着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稳步推进,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的CEPA、ECFA的发展,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规模不断增大,中国与亚洲、欧洲、南美洲国家和地区20个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实施,使人民币“走出去”的版图持续扩大。更有意义的是,离岸人民币回流机制基本形成,香港人民币离岸结算日趋成熟,亚洲开发银行已决定在其贸易融资项目(FPP)中使用人民币和印度卢比进行结算,中日两个大国也相互增持对方国债并签署了人民币与日元互换的协议,这标志着人民币在亚洲地区已经初步具备储备货币的功能。然而,人民币的崛起威胁到美元的市场份额,并引致美国的围堵和报复。如何突破这种困局,是关乎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计。

美元霸权是美国核心利益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历史经验表明,美国政治上的战略利益、霸权利益是要为其经济利益服务的,其中核心经济利益就是美元霸权利益。美元霸权通过两大支撑机制运转:一是纸币美元通过垄断石油的结算与计价符号,来控制国际石油市场的交易及国际货币市场的货币供求体系,确保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的价值锚定;二是将世界分工布局发展成为以中国为核心的实物制造经济体系与以美国为核心的货币供给经济体系之间的“双向循环和双向依赖”,确保美元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因此,与美元霸权相适配的全球经济运行方式,必然是以比较优势为理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以“华盛顿共识”为意识形态的经济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必然是以美元输出又顺畅回流为基础的、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顺差的模式。

为维持、提升全球对美元流动性的需求,在经济上行周期需借助美国

货币供给经济体系拉动实物制造经济体系的动力机制,攫取更大的相对收益;在经济下行周期、自身地位衰退时运用军事打击、金融战手段,打坏非美经济体投资环境,使美国成为相对较好的“烂苹果”,驱使资金回流美国,在竞争者崛起时惯用地缘、经济战略以及政治、军事等手段,打击、遏制竞争者崛起,阻碍、延缓、扼杀竞争者的货币国际化。

为此,美国政府、垄断资本以及华尔街金融大鳄,总是主动地、无意地、不经意地对可能威胁或影响美元霸权地位的竞争者,实施包括军事打击、政治压制和金融战在内的“全方位战争”。这一系列的证据包括:

第一,美国通过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两次击败伊拉克,使全球油价飙升,油价飙升拉高了全球的美元需求,同时,也顺势让伊拉克新政府将石油结算货币由欧元改回了美元。

第二,美国通过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日元完全自由浮动和汇率剧烈震荡,限制了日元在结算和交易环节的使用,阻碍了日元在国际贸易和资本项下的交易计价、结算货币功能的实现,加之日元升值后引发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日本自此踏上漫长的经济衰退并从此与日元国际化失之交臂。

第三,以索罗斯为首的对冲基金利用西德与英、意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缺陷,持续做多德国马克、做空意大利里拉和英国英镑,致使英、意脱离欧洲汇率机制(ERM),ERM也于1993年8月被类似于浮动的汇率体系所取代。索罗斯对冲基金狙击欧洲汇率机制在客观上打击了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延缓了美元竞争对手的形成。

第四,以索罗斯为首的对冲基金发动1997-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阻碍了东亚区域一体化,“教导”出东亚各国对美元流动性的渴求和对美元外汇储备的强烈依赖。

第五,美国组织的科索沃战争在欧洲腹地心地带展开,打坏了欧洲的投资环

境,使欧元由战前的1欧元兑1.07美元开始暴跌,最低跌至0.82美元兑1欧元,使欧元诞生之初就立刻面临夭折的危险。同时,利用美元汇率走强周期成功吸引热钱从欧洲流出并流入美国,美国在成功打击欧元的同时并顺势抢占了欧元的市场份额。

第六,美国在“9.11”之后发动阿富汗战争,打垮了盘踞阿富汗的基地恐怖组织,重建了美元的信心基础,并促使流出美国的资金陆续回流美国。美国于2011年5月击毙拉登并象征性地结束反恐战争后,全世界对美国投资环境的信心已空前巩固,在金融危机后动荡的金融市场中,美元资产相对于欧元和其他货币资产的低风险属性,成功吸引低风险偏好资金持续增配、超配。

第七,次贷危机后美联储不顾其作为实际上的全球央行的角色,片面、自私地从美国需求出发,实施了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两次“扭转”(OT),起到损人利己的货币战争功能,其中QE扩大美元供给、促进美元贬值,提高了能源和大宗商品的美元标价,增加了美元流动性需求,并在稀释美国债务的同时将美国国内过多流动性转嫁全球;OT则通过打高短期美元资产收益率的方式,吸引资金流入美国,但资金快速流向美国也引发了欧洲、新兴经济体等资金流出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甚至造成严重的国际收支问题。

突破美元霸权需要勇气和策略

美元本位的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美国通过过于庞大的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向全球输出美元,其所固有的削弱美元价值倾向将使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特里芬难题”(即作为国际货币要求的货币坚挺与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要求的国际收支逆差之间的矛盾)重新上演,一旦美国的“双赤字”超越市场忍受与认同的极限而损及美元的国家信用,维系美国资产市场繁荣的资金链就会断裂,对美元资产的逃离可能引发美元破裂性贬值,

从而导致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一损俱损”。危险性叠加上美元霸权的剥削性,客观上要求我国在经贸体量跻身世界顶级水平中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尽快摆脱美元霸权的桎梏。

人民币国际化在2012年最重大的进展是8月底中国-德国宣布中德贸易使用人民币和欧元结算,9月中国-伊朗、中国-俄罗斯分别宣布使用人民币作为石油贸易结算货币,加上中日之间货币互换计划加速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进程加速,美元的结算货币市场份额将被严重削弱。当美国藉欧债危机良机使美元大胜欧元,又在反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美国维护霸权的战略目标就仅剩遏制中国崛起,扼杀人民币国际化,由此也就演绎出地缘斗争中以“群狼”挑战中国领土主权,来分解中国发展力量,拖垮中国经济,经济斗争中以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来架空东亚一体化,以及以“射杀中兴、华为事件”为代表的滥用对华贸易保护措施来压抑中国外贸。

面对美国维护美元霸权所采取的围堵行动,我们不仅要勇气,而且必须采取有效策略,除了做好政治、军事、外交等全方位斗争之外,关键是要采取法律和金融手段,作出有效的反制。在法律上,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会员投票份额分配改革,通过民主投票机制促使IMF向全球央行转型并履行监督全球货币体系职责,摆脱美联储对全球货币政策的实际控制,从而确保我国在良好的法律环境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金融上,灵活增减持美国国债资产,制衡美国的侵犯压制行为,并积极培育亚洲债券市场,推进石油贸易以人民币和非美元货币结算,给麻烦制造者制造麻烦(据称9.18原油期货闪电崩盘”就与中国计划使用人民币进行石油贸易结算的传闻有关)。

(作者系招商证券高级经济师)

焦点评论

■舆情时评 | First Response |

塑化剂事件是去泡沫化的必然结果

胡语文

白酒塑化剂事件看上去像是偶然事件,但事实上却是白酒泡沫破灭自我驱动程序中的一个必然环节。白酒股在过去两年靠业绩驱动股价上涨的自我强化循环中,已经远远透支了业绩成长性,最终高速增长的故事无法兑现,利空消息就会像幽灵一样散发出来。

看看一些国内白酒行业的二三线品牌上市公司市盈率飞上了天空,高达80-90倍。理论上说,白酒行业利润增速与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增速之间保持较为紧密的关系,尤其是在2000年以后,两者相关性较强,说明白酒行业属于抗通胀的板块毫不夸张。但自2011年8月之后,两者出现背离。CPI向下而白酒行业利润增速仍居高

位,则表明白酒行业继续涨价的空间有限,收入与利润高增长难以维系,行业景气度已经见顶。

但消费股为何难以成为下轮牛市的顶梁柱呢?关键原因在于日常消费品和奢侈品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逆周期行业,但成长是有天花板的,毕竟,要大幅度提高人均白酒、榨菜、牙膏及中成药的消费量简直就是个真实的谎言。更何况经济增速下滑,带来的是一个系统性风险,中国消费品的消费增速还能够提升多少?

当然,中国A股市场一直热衷于炒,凡是有炒的机会,就一定不会放弃。由于在经济下行过程中周期股已经被“打趴下”,在中国资金面充裕的情况下,存量资金倘若不找点题材,则很难获得正收益,由此二级市场消费股的

泡沫应运而生。

但我们要提醒投资者,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业绩支撑,或者当股价的上涨早已透支了未来公司的10年成长,或者市场已经将故事讲得过分,那么,任何炒作投机都是一种零和游戏或负和游戏。换句话说,最终会有人要为此买单,为前面赚钱的人和讲故事的人买单。希望买单的人不是你。

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消费股被主流资金抱团推动,导致其价格远离内在价值,大幅透支正常的业绩增长,加之一些人热衷于讲述消费增长的神话故事,最终导致一些股价创出了历史新高。然而,按照历史的经验来看,神话故事并不符合客观事实,一旦神话破灭,飞起的股价最终也就降到了起跑线。

目前市场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过去惯性的多头思维已经容易落入刻舟求剑的窠臼,并不适合市场的快速发展,随着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等创新工具的登台亮相,一味的做多已经不适合市场客观需要。

我们想说的是,即使你不会参与融券卖出白酒股,但时刻保持理性和客观的分析,对一个理性投资者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作者系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特约观察员)



新浪微博 weibo.com

欢迎关注“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新浪官博

@公司舆情 http://weibo.com/u/2094447647

乍暖还寒 经济复苏曙光已现

傅子恒

我国经济增速持续多月下滑趋势促使“向上对冲”的政策升温,物价总量水平持续稳定给积极政策加持提供有利机遇。央行年内两次降息、两次调减存款准备金率,发改委集中批复一批城市轨交、公路建设、港口、航道以及市政基础设施等基建投资项目,则成为新一轮投资反周期操作的一个标志。

观察而言,新刺激政策与以往相比给人们留下两个深刻印象:

一是新规划更注重细节深化与实际落实,比如对城轨建设涉及的逾万亿元项目资金来源问题,发改委酝酿以发行基础设施和债券形式进行筹措,证监会也发出通知,降低基建债权计划门槛,鼓励险资扩大向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货币政策方面,央行下半年之后更频繁采用公开市场操作而谨慎选择总量工具操作,在发达经济体全面“量化宽

松”背景之下力图保持独立性而没有亦步亦趋。

二是新激励计划更加注重政策的综合配套与长期社会发展目标协同,今年以来陆续推进的铁路与城际轨交建设、沿海经济带建设与海洋功能区划、国内贸易十二五规划、鼓励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兼并重组、结构性减税等各项政策,范围涉及财政、产业、地域发展、城市建设、对外贸易等多项政策领域,在政策组合与目标涉及短、中、长各期,短期建设加强与长期社会发展规划进行更加紧密结合。

政策落实过程中所带来的投资增加,很显然逐步显现成效,经济下滑趋势得以部分对冲,9月之后,宏观数据指标开始好转。首先是反映宏观经济信心走向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好转,10月份国内发布的中国制造业PMI上升为50.2%,重回荣枯临界点之上;汇丰中国PMI11月初值为50.4,

连续3个月劲升并在时隔13个月之后重返50荣枯分界线以上。其他宏观经济数据也全面好转。

经济数据指标显示宏观经济向积极方向演化,但同时数据也显示这种复苏力度较弱,一些数据依旧低迷、一些数据相互矛盾,其表现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连续7个季度回落:一季度增长8.1%,二季度增长7.6%,三季度增长7.4%,三季度增幅同比创下14个季度新低。跌幅虽收窄但尚未有出现拐点。

二是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回落至2%以下,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多月为负值,同时PMI指标刚刚回升至50临界且稳定性仍待观察,显示生产者信心需要进一步恢复。

三是与总量扩张相比,来自微观层面的信息出现矛盾且效益指标仍在“筑底”。前三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增速比上半年回落

0.5个百分点;沪深两市2400余家上市公司三季度实现净利润同比下降2.6%,与1-9月份同比下降1.1%相比仍在扩大,显示微观主体经营效益向下滑落的趋势仍在延续。

四是欧美发达经济体不确定性影响继续存在。这种影响体现在外贸萎缩方面,相关部门已经表示2012全年我国外贸增长完成10%目标有很大难度;也体现在为应对经济低迷,美欧国家财政、货币政策传导对国际大宗商品所造成的波动性影响对国内相关行业的冲击方面。

因此,关于中国经济近期表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复苏已初现曙光,但走势显然是“乍暖还寒”,在内、外部需求都没有最终恢复之时,要延续这种刚刚出现的部分宏观指标的复苏势头,使经济步入真正的复苏阶段,显然还需要积极与宽松政策的热度保持。

(作者系万联证券研究所负责人,经济学博士)

■储心积虑 | Chu Zhusheng's Column |

扭曲的城市化之路亟需修正



储著胜

近日贵州毕节5个流浪少年集体在垃圾厢窒息而死的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留守儿童这一并不新鲜的话题再次引起人们的热议讨论。在我看来,一起悲剧事件的发生与我国扭曲的城市化之路有着极大的关联。

扭曲的城市化之路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着力推进城市化进程,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1.27%。这成就可谓前无古人。城市化之路的伸展,不仅使我国的经济规模一跃成为世界第二,而且也使我国的政治面貌、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社会发展格局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成就的背后也隐藏着各种阴影,扭曲的城市化所形成的恶果正在逐渐显露,它提醒我们现在有必要放慢一下前行的脚步,认真回望与反省过去的历程。

真正的城市化不应该是单一的劳动力的城市化,而应该是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整个社会关系的城市化。反观我国,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城市化的仅仅是劳动力及其载体,劳动者的户籍、医疗保障、家庭等等这类人们正常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社会要素都留在了乡下,没有与同行。这种残缺的城市化就可避免地导致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就劳动者个人而言,他们虽然身在城市、工作在城市,却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他们不能像城里人那样享有一个正常人所需要的:没有住房、没有天伦之乐、没有福利保障。在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里,数以亿计的人呈现出这样的生存状态显然不是政府和社会民众所期盼的。

劳动者走进城里,留守在农村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家庭成员的长期分隔导致该由子女赡养的老人无人赡养;该由父母抚育的小孩无人抚育,使这些老的老、小的小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人群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自由放任状态。由此引发种种问题和悲剧也就难以避免。贵州毕节5个流浪少年的不正常死亡不过是一个最新的例证而已。

习近平总书记15日在记者会的讲话中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与之相对照,我国的城市化之路可以说实在是偏颇过远。

四大修正之策

对于扭曲的城市化所显露的问题,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房价的高企、土地的浪费以及城市的过度膨胀,至于进城农民如何实现由单一劳动力进城转向包括个人和家庭在内的各类社会身份要素全方位进城,彻底实现市民化这一问题,讨论得却非常不够。

在我看来,进城农民要彻底实现市民化政府部门至少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努力:

首先,要改革目前的户籍制度。我国目前城乡割裂的户籍制度存在多方面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一、削弱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及人才市场;二、对农业现代化及农村人口的转移形成体制性障碍;三、遏制了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大量城市务工农民,连基本的生存条件及安全感都没有,身份不明工作不稳,城市需求及消费畸形发展;四、阻碍了城乡统筹,加剧了社会分化。因此改革势在必行。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显然是个好消息。进城农民市民化一方面可以减少他们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支出,有效降低其生活在城市当中的各类成本;另一方面使他们能够拥有更多方面的权利,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生存与发展。

其次,土地制度要改革。土地财政的广泛存在一方面说明土地给各地政府带来的利益是惊人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农民在土地方面的利益损失是极其巨大的。由于土地没有给农民带来应有收益,所以当离开土地走入城市之后绝大多数人就只能无可选择地沦落到城市社会中的最底层。这种不合理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这说明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由于征地制度只涉及一部分农村土地,所以就农村土地的整体状态而言,改革所要做的就不仅仅是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而是要实现农村土地所有权的重新确认和可自由贸易化,如此农民才能拥有可兑现的资本,当他们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之后才不会一无所有,他们有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也就能够更容易地融入城市生活当中,不至于像目前这样长期被边缘化。

再次,保障性住房建设要继续坚持。大力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可以说是近年来政府采取的一项最受民众欢迎的民生举措,虽然其中还存在各种问题,但其总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大量建设保障性住房不仅有利于抑制房价也有利于抑制房租,这对于解决低收入阶层的居住问题自然是件大好事。农村转移人口多属城市低收入阶层,能寻找到一个适合于自己的安身之居是他们在城市生活下去的一个起码要求,价格高高在上的商品房当然和他们无缘,他们所能依赖的就是这些保障性住房(当前阶段众多处于灰色地带的产权房起着类保障性住房的作用,有必要通过制订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清理整顿最终使其合法化、阳光化)。因此,保障性住房建设步伐能否赶上城市化的进程,是衡量城市化含金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目前政府这方面的欠账很多,有必要加紧偿还。

最后,收入倍增计划要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十八大报告当中最振奋人心的目标莫过于2020年实现居民收入倍增。需要指出的是,居民收入倍增并非指社会所有阶层的收入都同比例地增长。实际上,对于那些高收入的阶层,如垄断行业的从业人员,其收入不仅不能倍增,反而需要通过一定的手段进行适当的调节,使其回归到合理的水平上;而对于包括进城农民在内的低收入阶层,则需通过提高劳动力在初次分配当中的分配比例,使其收入能以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速度不断增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为了弥补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欠账,另一方面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使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和谐。当然对于进城农民来说,更重要的还在于努力提高其劳动技能,使其能够拥有更强的获取收入的能力。

进城农民市民化,是城市化这一重大课题当中的应有之义。扭曲的城市化之路必须修正,只有实现真正的城市化,像贵州毕节5个流浪少年这样的留守儿童才会群体消失,此类的悲剧自然也就能够得以避免。